



诗歌

更大的格局与更深的意味

□李 壮

- ◆我们身处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,诗——什么才是诗、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——正越来越难以不言自明。我们渴望重新树立诗的形象和影响力,背后的任务是,我们需要更有力、更有效地厘清对诗的理解,凝聚对诗的共识
- ◆我们不应该只关注“身份”而忽略了新大众诗歌作为“文本”的一面,尤其是不应该把新大众诗歌自动想象成简单的、无深度的、反技术的写作。时代已经赋予“新大众”新的形象与能力,其话语方式和自我表达策略也超出我们的许多惯性认知
- ◆诗歌是古老的手艺,但古老并不意味着一定要“刀耕火种”。只有脑中的思路更新、心里的格局更大,我们笔下的力道和意味才能更深更远——这正是“破圈”话题背后最本质的期待与追求

2025年12月26日晚上,我开车回家时听车载广播,忽然在“中国之声”栏目里听到对农民诗人吕玉霞(“沂蒙二姐”的专访)。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,我曾在无数场景中听到或参与对文学与诗歌的谈论,但此刻兀然从电台里听到谈论诗歌的声音,令我生出别样的亲切感。过去的一年中,诗歌的身影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许多新的、更公共化的场域之中。我强烈感受到,诗依然是被关注的,也始终是被需要的。它其实无处不在,我们只是需要以更宽广的视野、更平和的姿态、更纯粹的本心去面对它。

经典化渴望与共识探寻

几年前,关于“汉语新诗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诗人”的讨论曾颇具热度。“大诗人焦虑”背后的命题,是汉语新诗如何树立“自己的经典”。这一问题确实紧要,但经典的形成是一种动态的过程,需要时间,尤其是在路径多元、声音多样的互联网传媒时代,“经典的炼成”恐怕已很难依据固有模式来按部就班。2025年,诗歌界关于“经典化”的讨论似乎已没有那么热烈(毕竟经典从不是“谈”出来的),但大量带有经典化意图的实践正越来越蓬勃地展开。这从诗集出版角度可窥见一二。2025年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重要诗集,其中有两种出版策略颇可玩味。

其一是“披沙拣金”式策略。许多知名诗人的创作生涯进行阶段性总结,大量“多年精选集”出版——这是梳理打造特定诗人总体创作形象的典型方式。例如,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北岛的50年诗歌自选集《守夜》,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了陈先发的40年诗选《碧水深涡》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林白的40年诗歌精选集《身体的雷霆》等。“生涯精选”出版热潮其实已出现数年,但2025年类似成果似乎格外多,呈现出“多点开花”的态势。

所谓的“多点开花”,不仅是指不同的出版社都开始推出相似策划,还包括读者主动介入了“精选数十年”的经典化过程。近期,李元胜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“无限事”上发文,“早晨起来,发现上海那边出了件大事……泡芙云书店和她的读者们,抛开作者,仅从读者角度对我选编了一本诗集”,诗集名为《通常我都坐在生活边上》。李元胜微信朋友圈的转发按语说得更有趣:“这一届读者太有想法了,他们对我选编诗集忍无可忍,今天终于出手了。”读者有想法,当代诗歌的经典化才有办法。实际上,李元胜自己的“无限事”公众号在“想法”上也有代表性:2025年,该公众号主推的两个栏目:一个叫“××最满意的十首诗”,另一个叫“××的诗,就读这二十首”,显然具有“阶段性经典化”意图。可作呼应的例证是,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推出了“诗人流传最广的诗:××篇”的系列策划,“一见之地”公众号则打造了“一人一首流传最广的诗”系列推文。“经典意识”或至少说“遴选意识”,显然已深刻影响到自媒体时代的诗歌宣推传播逻辑。

其二是“聚光集影”式策略。很多诗人推出了主题式诗集。在这类诗集中,诗作大多具有明显的题材聚焦姿态,指向某一共同主题,或在特定书写领域里开展接续性的深耕。沈苇的《水上书》聚焦浙江四条诗路(浙东唐诗之路、大运河诗路、钱塘江诗路、瓯江山水诗路),其创作实践被认为带有“行动诗学”意味。江非的《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》聚焦乡土自然,凝望具体乡村生活经验,从大地体验衍生出生命的思辨与诘问。阿信的《雪山谣》一如既往关心西北雪山草原,叶丽隽的《群山有赠》立足浙西南山居心境,谷禾的《泥沼之子》也延续着诗人“由日常及内心”的诗意生成路径。龚学敏的《白雪与挽歌》以“小长诗组合”的方式,专题书写东北抗联英雄历史。

诗刊社推出的“新时代诗库”中,薄暮的《治工记》、李长瑜的《纳米》、申广志的《石油季节》等诗集都是姿态鲜明的“新工业诗集”。这些创作成果与2025年诗歌界一系列“新工业”主

题的研究与行动实践(如《诗刊》于2025年第5期推出“新工业诗歌专辑”并与东莞共同开展主题征文及研讨活动、《诗探索》2025年第1辑推出“新工业诗研究”专题、“十月”在“十月诗会”举办“新工业诗歌的个性化书写”研讨会等)密切配合,进一步推升“新工业诗歌”延续多年的话题热度。

与“如何展示诗”相关,另一个重要的话题维度是“如何理解诗”。我们身处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。今天的话语场上,很多人都在说,但少有人认真听,或者说大家看起来都在听,却很少下决心去认真想。在这种情形下,诗——什么才是诗、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——正越来越难以不言自明。我们渴望重新树立诗的形象和影响力,背后的任务是,我们需要更有力、更有效地厘清对诗的理解,凝聚对诗的共识。在我看来,目前诗歌领域的情况是,“识”很多,但不够“共”,一些基础性、常识性的观念和标准,还仅仅“流通”于范畴较小的专业圈层之中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当代诗歌的发展成就没有获得广泛承认,甚至常常背负某些误解。

再往深里说,我甚至感觉,即便在所谓的“专业圈层”内部,许多观念和价值大概也还斑斑点点地模糊着,呈现出错位的“代差”与“温差”。当代诗歌如要建立共识、树立经典,“思”是一件与“写”同样重要的事。2025年,吴思敬在《南方文坛》刊发《百年新诗学案》总序,尝试以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中的“事”为中心,“针对有较大影响的人物、事件、社团、刊物、流派、会议、学术争鸣等,以‘学案’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”,进而“论从史出”,探索一种“全新的对百年新诗发展的叙述”。存照历史是为了启迪当下,《文艺争鸣》推出“当代新诗的历史反思”专辑,以历史化眼光审视新诗发展,其中张伟栋、张定浩、王东东等人的文章涉及诗歌史、诗歌批评、诗歌观念更新等多重角度,具有启发意义。

谈论诗在本质上也是谈论人。“文本”与“人本”的碰撞对话,正获得越来越多的理论关注。张清华在诗歌批评集《诗歌的肖像》序言中谈道,在技术宰制的时代中,“重新思考‘人本’与‘修行’问题,似乎有了新的必要……所有伟大的、杰出的文本,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划痕的文本,都首先是语言击中了我们。但是在语言的背后,感动我们的东西究竟是什么?肯定还是那背后的主体”。霍俊明出版著作《九叶传》,既是从史料文献出发对“九叶诗派”进行整体性的回望阐释,更是在呼唤真正诗人所应具备的那种富于良知的、“众树独唱”的文化人格。

从特定技术话题局部向理论深处掘进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,例如李章斌出版专著《“声”与“形”——新诗节奏研究》。这一话题是高度理论性的,但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理论。在融媒浪潮强势支配、“听诗”比肩于“读诗”的传播背景之下,“诗歌与听觉”的话题呈现出空前重要的现实意义。诗刊社于2025年推出“新时代诗歌诵读工程”并开启征稿,也可以将之置于此话题之下进行观察与讨论。

“新大众”与“新青年”

2025年文艺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,便是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。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之中,诗歌是表现极为突出、影响广泛而巨大的领域。

以中国诗歌网成立十周年为契机,诗刊社召开首届“新大众诗会”,《诗刊》主编李少君所说的

生命的烙印,语言简洁有力,充满想象力,可谓我们这个时代的“新乐府”。”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舞台之后,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在2025年出版了新诗集《手持人间一束光》《世界把我照亮》。花城出版社推出了东莞“新大众文艺丛书”,其中包括温雄珍的《在炭火上安居》、曾为民的《赶石头的人》、沈汉炎的《有些光不会消失》、易翔的《东莞时间》等诗集。

这一现象引发了诗歌评论家们的关注。张清华在《文学评论》发表论文《“新大众诗歌”的历史溯源与当代新变》,认为“大众诗歌观”植根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,并与“五四”后的现代伦理意识形态深度结合,当下的新大众诗歌已在“新媒体性”“个体身份自觉”和“真实性”等方面体现出新质与生命力。崔博则在《“新诗人”如何书写“新大众”》一文中认为,新大众诗歌能够满足大众情感需求、还原生命原初情境,“整合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破碎的经验与情感,将个体重新还原为具有丰富生命感受的人”;同时,它还可被视作是对“引经据典、故作高深,在‘不及物’道路上已走出很远”的诗歌范式的反拨。

当然,值得提醒的一点是,我们决不能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理解新大众诗歌与所谓“专业诗歌”“精英诗歌”(其实这两个概念也近乎“伪概念”)之间的关系。一旦在概念上搞“对峙”和“对立”,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某种“零和博弈”陷阱,最终把一切生机勃勃的新事物都变成意图先行的符号。具体来说,我们不应该只关注“身份”而忽略了新大众诗歌作为“文本”的一面,尤其是不应该把新大众诗歌自动想象成简单的、无深度的、反技术的写作。我们对“新大众文艺”的主体理解要有所更新,时代已经赋予“新大众”新的形象与能力,其话语方式和自我表达策略也超出我们的许多惯性认知。例如,2025年我在网络平台上读到这样一首诗:

老头儿
你去哪里了?

我看你你的小提琴
丢弃在你家
门口的破沙发上
那时下着雨
雨水拍打琴弦

我去看你家送快递
没有人开门

这首诗的诗题叫《小夜曲》,作者是邓胡子。根据网上搜来的简介,这位贵州籍的青年诗人可能做过送快递之类的工作。这首诗的技术水平非常“在线”(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专业),全诗情绪节制、细节准确、语言干净,尤其是行动(“送快递”)、环境(“破沙发”)与核心意象(“小提琴”)之间的跳跃式结合,产生了令人惊异的审美张力。这首诗并不“浅”,也并没有刻意凸显写作者自身的身份符号(相反,它的力量来自对陌生他者的关切和共情)。它的“好”首先是作为文本自身的好。我想,我们应当真正以“诗的方式”去关注和谈论新大众诗歌,这是对“新大众”与“诗歌”的双重尊重。

诗歌的新动能,不仅来自职业身份,也来自年龄代际。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“文明的回响:2025国际青春诗会(中国—拉美国家专场)”,来自拉美15个国家的40位青年诗人与30余位中国诗人以诗歌之名共聚西安和北京,“不同语言朗诵同一首诗”成为年度文化亮点。

“00后”诗人的集中登场,构成2025年诗歌现场色调明丽的景观。一群年轻诗人编选推出了《迟语年代:00后诗选》。《北京文学》连续四期推出“00后诗歌大展”,随后又就此话题策划系列评论及笔谈。赵汗青认为,“网生代”年轻诗人和评论家参与讨论,核心观点之一是“诗歌本是大众的事业”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大口呼吸春天:皮村文学小组诗集》,张慧瑜在该书序言中表示:“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劳动生产和个体

情感(赵汗青在《无限大中守住小——读“00后诗歌大展”》)。孟垚用“对语言技巧的高度锤炼、对个人情感和生命经验的深刻关注、对跨学科资源的丰富调用”来归纳“00后”诗人的共性特点;马欣雨则提到,自己会关注同代诗人“是否在共同的轴线上产生对某一维度的偏离与思考”(《关于00后诗歌的笔谈(一)》)。王士强则从语言角度来观察,认为“现代汉语诗歌最为重要的责任之一便是抵制现代汉语的腐败……恢复和发扬它的活力、诗性、创造性与可能性”,而语言修辞探索正是这一批青年诗人的显著强项。但因此也更需警惕,不能使诗歌“仅仅成为一种‘技艺’,止步于一种语言行为、修辞行为”(王士强《“00后”诗歌,小时代,语言诗学》)。

年龄之“新”内部亦有辩证,我们不能忽略对“旧青年”的“新打量”。在诗刊社举办的“70后诗歌研讨会上”,刘春、江非、邰东等诗人从“70后”诗人的登场方式、现状处境、诗歌史位置、未来去向等角度,给出了许多坦率、深入甚至颇为犀利的分析,其中的许多思考显然不仅对特定代际有效。这也启示我们,诗歌之“新”不是耗材,不是青春流量噱头,而是要持续地、长期主义地,很多时候也是非功利化地去挖掘诗歌内的新话题、真问题。

诗歌的“融媒”与“破圈”

2025年春节前后,DeepSeek 横空出世。几乎一整年内,“人工智能与写作”都是文学界的热点话题。《文艺报》第一时间在头版推出《DeepSeek 强势出圈,写诗不再神秘?》《“人机共创”,能否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方式?》等专题报道,并就“春节”主题推出人类与 AI“写同题诗+评同组诗”的整版策划。《星星·诗歌理论》推出“DeepSeek 写诗”专辑,邀请哲学、出版学、计算机学、法学等不同背景出身的诗人从各自专业角度展开探讨。李少君先后发表《AI 时代,更要激活和强化人的主体精神》《AI 时代写好你的个人史》等文章,认为“AI 的到来,正是新文明的预兆和起点”,文学的创造力可能获得跨越式激发,而独属于人的生命感受、主观情志、主体精神,会在 AI 时代变得更重要。中国诗歌网启动升级工程,成为国内首家接入 DeepSeek 的文学平台,对用户发布的诗歌进行 AI 自动点评。诗人沉河在微信公众号“守界园”上创办网刊《守界 AI 文学》,全部发布 AI 创作作品,涵盖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文学理论评论等多种文体。

AI 创作涉及复杂的文学伦理问题。许多文学刊物表示,坚决抵制作者使用 AI 作品投稿,因为文本原创性以及作者主体的生命体验,乃是刊物对稿件的本质要求。网络自媒体上,也不时出现对“诗歌 AI 味”的鉴别举证。就我个人来说,用 AI 生成一首诗,再挂上自己的名字发表,这显然是一件不可接受的甚至是自我侮辱的事情。但许多问题又空前复杂:是否只要有 AI 介入,就意味着一首诗是“非原创”的?什么程度的 AI 介入会在本质上改变作品的性质?如果有些作者根据 AI 的建议对一首诗进行了修改,或者在写诗过程中就特定场景请 AI 提示了几个可用意象,这是否算是“人机共创诗歌”呢?这类问题尚未有明确解答。可以想见的是,随着 AI 技术的持续发展,这种难题将更深、更暧昧地缠绕在我们身上。

数智技术带来挑战也提供机遇。“融媒介”无疑是2025年诗歌领域的重要话题。最鲜明的样本是我开篇提到的“沂蒙二姐”吕玉霞。“沂蒙二姐”通过一系列“诗歌短视频”爆火,她所展示的显然是一种溢出传统纸质形态的“泛诗歌文本”。丁鹏在《“沂蒙二姐”走红:所有的宏大叙事,都始于田间的诗》中分析:“评价吕玉霞的诗不应脱离其短视频的表现形式。显然,吕玉霞的作品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诗歌文本……诗歌的文案、本人的演绎与田园的背景共同构成了吕玉霞的‘视频作品’。吕玉霞的作品是诗,但却是以戏剧性的方式表现的诗,不是供

阅读或朗诵的诗,是供观看和续写的诗。”这些作品经由“玩梗”“续写”获得火爆传播,又与新媒体平台的运行逻辑、算法策略深刻相关。“影像化”与“算法逻辑”,在此是核心关键词。

近年来,诗歌产品的“视听化”与“生活化”趋势引人瞩目。王伟旭在《新媒介、当代诗与新大众文艺的文艺形式问题》中分析了“代码诗”“新诗音乐”“小红书图文诗歌”“B 站评论区/弹幕诗歌”等新型诗歌现象,并提出面对网络时代的文艺新样式,我们要思考“为何这种样式在今天能够被公众感知?为何它被平台推荐?为何它能够引发广泛的模仿与再生产?”诗刊社联合中国诗歌学会共同打造的“云中诗会”(“中国诗歌地图”系列活动)则是依托线上直播形式,让专业性诗歌对话变得可视、可听、可参与,增强了“此刻此景”的全息交互感。总体来说,“诗歌底本+视听影像”的融合模式越发多见且成熟,逻辑性、符号性的文字材料越来越自然地与直接感官经验(视觉与听觉)协同运转,“泛文本化”正成为移动终端时代诗歌传播的重要趋势。

形态的“跨界”,关联着“破圈”话题。诗歌的“破圈”,一方面是要把“外”引进来,打破内部循环机制。告别“熟人社会”玩法,破除无形的视野围墙和虚妄的身份偏见,越发成为诗歌界的普遍追求。许多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受到关注的“自媒体诗人”进入传统刊物视野,如在“小红书”上走红的年轻诗人焦野绿和惊竹分别成为《诗收获》2025年春之卷、夏之卷的“季度诗人”。而在“看到他们”“接触他们”之后,如何“谈论他们”“对话他们”,或许是“破圈”行动中更重要也更艰难的命题。老实说,这类诗人的诗歌作品,在内容与写法上,确实与我们惯常谈论的诗作有颇多不同;或者说,他们的写作匹配的是另一套话语框架、另一种传播逻辑。如何与“另一种”相处?诗歌的价值标准,显然不能追随流量任意更改,但一种弹性更强的对话能力、胸怀更宽的欣赏能力、视野更大的分析能力,显然是应当具备的。

另一方面,是要把“内”扩出去,强化诗歌向公共日常生活的扩散辐射能力。我举两个小例子。

一是“磨铁读诗会”。2025年,民间诗歌品牌“磨铁读诗会”在杭州举办了十周年展览系列活动。在展览前言中,“磨铁读诗会”对自己的定位是“只是一个开放性的诗歌发表和传播平台,在移动互联网的前沿,持续观察一个个诗人的写作”。我曾参加过他们的年度诗歌活动,活动办得“很欢乐”,场所常常是在书店或小剧场之类的公共文化空间。这种公共性姿态很触动我。

二是“马戏团诗丛”。这套丛书由诗人茱萸主编,收入了刘崇周、李遂、胡木、黎星雨、周钰淇5位“90后”诗人的5本诗集。“马戏团诗丛”很特别的地方是对“诗歌周边”的重视。几位年轻诗人设计推出了许多物料意义上的“周边文创”,包括但不限于帆布包、马克杯、明信片、文化衫、不倒翁盲盒、胸针、冰箱贴……都做得精致漂亮。5位诗人还为自己打造了萌化的、极具二次元意味的诗歌身份代号(相当于“打造虚拟人设”),这类似于把人也做成了“文创”。最令我惊讶的是,5位年轻诗人居然在成都最熙攘的春熙路地铁站大厅租了大屏,于人流高度密集处滚动展示诗从海报。当诗歌的形象夹在海底捞火锅和天梭手表的广告中间循环出现,被无数人随机看見,我丝毫不觉得突兀。我觉得诗歌本来就应该这样玩。

我想,在今天仍愿意投身诗歌的人,必然是爱诗歌的,既然爱诗歌,就该用心把诗歌的事情做好。而这个时代的“做好”,显然不能再闭门造车,甚至不一定非要正襟危坐。真正的诗歌,本就应该与无数的陌生人走在一起,与嘈杂而宽阔的公共生活挨在一起。诗歌是古老的手艺,但古老并不意味着一定要“刀耕火种”。只有脑中的思路更新、心里的格局更大,我们笔下的力道和意味才能更深更远——我想,这正是“破圈”话题背后最本质的期待与追求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理论研究处副处长、副研究员)